

海的前面依旧是海，是谁在编织美丽的谎言



无岸的海

杨志军 著

禁
外
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无岸的海

杨志军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岸的海 / 杨志军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404-8

I. ①无…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106号

无岸的海

作 者：杨志军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管 文

策划编辑：木易雨田

特约编辑：宋亚荟

装帧设计：杨祎妹

版式设计：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4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20印张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404-8

定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泡在海里的太阳显得有些绵软和慵懒，迟迟不肯浮出水面，天际线上，乳白的一溜已经飘荡許久了。海正在清梦里打着哈欠，早潮不知不觉涨起来，浪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来自东方的光以柔和的黑亮铺洒在就要被潮峰打湿的海滩上，一条由各样海菜组成的绿色防线镶起了随时都在移动的花边。追逐亮色的鱼几乎要探出海面，勤快的鸥鸟开始了一天中最早的捕食。黑黝黝的防波堤像一头昨晚才搁浅的正在向深水挣扎的巨鲸。离它不远，是停靠在六号码头上的最大的轮船“不来梅”号。惨烈的惊喊就从“不来梅”号上传来：“杀人了，杀人了！”接着就是枪响。鸥鸟“嘎嘎”叫着飞升而去，划出一些散乱的曲线，远离了轮船和堤岸。有人拉响了汽笛，但显然不是为了启航。惊恐和慌乱中，绵软的被海水挤压成扁圆的太阳冉冉升起，以血红的色彩照亮了甲板上那个抱着卡宾枪、举着斧头的凶手。他面前的人纷纷倒下。云在奔跑，天一下子瓦蓝了不少。一阵狂风从海上吹来，想吹走这疯狂的杀戮，却让疯狂传播得更远：“杀人了，杀人了！”已死和将死的人都被凶手丢进了海里，锚地的水面血红一片，“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鱼儿们从未遇到过如此丰盛的早餐。

1

那时候我是香港《华报》的记者。报馆之所以派我去青岛，除了我是一个青岛人，熟悉这座城市，还因为我是该报忠心耿耿的老人手。被调查的事件发生在“皇族”。“皇族”是一家老牌的德国贸易公司，总部在不来梅，香港有它的经营分支机构：一家船舶公司和一家贸易行。青岛的“皇族”也是分支，叫“皇族资本”，感觉是一个金融组织，事实上它的经营范围要大得多。据说青岛最早的德式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都跟它有关系，不是它承建就是它投资，“不来梅”号也是“皇族资本”制造并经营的一艘准军事运输舰。从1897年到1914年，德国人在青岛经营的17年里，最早出现在风景优美的青岛湾的，就有一条“皇族街”，街道的命名显然是因为“皇族资本”在这条街上。“皇族”在《华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它最大的股东，报馆派遣我去调查，自然就有自惜羽毛的意思了。

我于早春二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从香港启程，坐“倚云”号先到了上海。我在上海没什么事，但“倚云”号有事，好像是接人。“倚云”号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私营的货邮两用轮船，用一艘英国造的驱逐舰改装而成，航速

很快，虽然必须在上海耽搁一天，但比起其他邮轮来还是要快。船上的人纷纷上岸，我也不例外，心说：何不趁机去看看锦章呢？我们有三年没见面了。

老朋友陶锦章是法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工作和居住都在法租界。我坐着洋车沿外滩走向市内，感觉已是世纪末的萧条了，很多商店都挂起了抛售货物的招牌，但顾客依然稀少，大概是招牌上又写着“只收银圆”的缘故。已经关门谢客的商店比比皆是。人们行色匆匆，不管是穿着讲究的有钱人还是衣裳破旧的穷苦人。逗留在街边静止不动的只有两种人：乞丐和好久等不来顾客的洋车夫。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拥挤在一家店铺门前，我问车夫那是干什么的。车夫说：“买粮的，现在只有卖粮的不拒收金圆券，政府强迫的。先生，你能不能不给我金圆券？”我说：“放心，我付你美钞。”车夫笑起来，脚步一下子轻快多了。法租界四周拉起了铁丝网，只能从切断了梧桐林荫道的栅栏门里走过去。我从洋车上下来，没走几步，就被戴着白色钢盔的法国警察拦住了。他用流利的汉语告诉我：要么我允许他彻底搜身，要么我离开这里原路返回。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三年前可不是这样。”警察利索地搜了身，又打开皮夹子记下了我的名字和要找的人，才放我进去。

医院在租界的中心地段。锦章一见我，就从二楼窗户探出了身子：“喂，是若缺吗？”我正在踏上医院大门前的石阶，仰头一看，发现他的脑袋光溜溜的。我问：“头发呢？”他说：“等着，别上来。”片刻，他跑下来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箱。医院正在

把一些设备运回法国，已经不接收病人了，大部分医护人员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也基本没事可干。我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锦章说：“我也知道，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想迈出那一步。”“你想去哪里？”“院方希望我跟他们去巴黎。你呢？”“没想好，总不至于连香港也沦陷吧？”“难说。”

锦章先带我去他家见过他太太，放下行李箱，又带我去了拿破仑餐厅。偌大的装饰豪华的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锦章说：“过去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富豪大亨，现在租界封闭了，谁来？上海滩的所有租界都用上了铁丝网的围墙。”我说：“几根铁丝就能挡住共产党的千军万马？外国人真可笑。”“不可笑，他们是想拦住暴徒。”“上海有暴徒？”锦章吃惊道：“你没听说过‘皇族事件’？”我愣了。锦章又说：“不光租界，你到那些外国公馆、外国公司去看看，墙上都架起了铁蒺藜，有的还通了电，挂了‘电死不赔’的牌子。门口和周围不仅有自家的保卫，还有政府派出的军警。人人感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怕的倒不是共产党，是那些蛮不讲理的暴徒。”我没想到“皇族事件”会在上海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等我告诉他，我去青岛就是为了调查“皇族事件”时，锦章忽地站了起来。

他说：“玛丽娅好像就在‘皇族资本’，你一定要去见见她，让她千万小心，必要时你要替我保护她。”“玛丽娅是谁？”“我在青岛市市立中学的同学，也是这些年唯一不能忘怀的故旧。”“怎么不能忘怀？”“漂亮呗，再就是……善良。”“你是

有太太的人，还惦记着人家的美丽、善良。”“那是两回事，我迄今保留着她上学时的照片，还跟她有通信来往。”我说：“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青岛，看看她。”他摇摇头：“我给太太怎么说？能去早去了。”牛排已经上来。锦章坐下来要我“慢用”，又问：“你结婚了吗？”“这么大的事，我没告诉你？”“没有。”“那就是没结。”锦章笑道：“我把玛丽娅介绍给你要不要？”“别把你不要的让给我。”“我是没福气。”又说，“马奇主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院长也要前往青岛调查‘皇族事件’，今天就出发。我也拜托他关照一下玛丽娅，最好能说服她尽快离开青岛。”“一个主教去调查什么？”“联合国邀请他参加‘五人调查委员会’。”“什么？你再说一遍。”

现在轮到我站起来了，一边咀嚼一边说：“我得马上回到船上去。”我对“玛丽娅”毫无兴趣，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个专门前去调查“皇族事件”的记者，对这个“五人调查委员会”竟然一无所知。联合国都要插手了，这么大的事，派我来的《华报》主编弗兰斯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透露给我？锦章说：“沙拉和汤还没上呢！”我说：“不用了。”锦章匆匆付了账，随我出来，路上叮嘱道：“到了青岛别忘了剃成光头。”“为什么？”“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在‘皇族事件’中，几个幸存者都是光头。”我说：“上海的记者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凶手在逃，国民政府和‘皇族’机构到目前都还没有对外公布过任何细节，连死人的数字都是模糊的。我去就是要全面、细致、

真实地报道事由和经过，别听他们捕风捉影。”

在锦章家取回行李箱时，锦章的太太正在客厅收拾东西。她把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一个木头箱子里，一再地斟酌着：“要不要呢？丢掉就太可惜了。”锦章说：“可要是连这些瓶瓶罐罐都舍不得丢，十个箱子也装不下。再说了，还没决定去哪里呢，你瞎忙什么？”我说：“应该在最后一刻决定取舍，到那时就知道什么最重要了。”锦章太太说：“你们男人知道什么，一手忙脚乱，就丢三落四。不管去哪里都是要走的，早点儿做好准备心里踏实。”锦章解释道：“原本她是不想走的，说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亲戚朋友都在这里。‘皇族事件’一出来，不走也得走了。”锦章太太说：“你在外国人开的医院当大夫，人家能饶得了你？听说暴徒恨你们这种人比恨外国人还要厉害。”我说：“他是给人看病的，又不是汉奸走狗做了叫人家戳脊梁骨的事，你紧张什么？”锦章太太说：“不光阿拉^[1]紧张，全上海吃洋人饭的都是过了今天莫得明天的样子，那些天天说洋文做买办的更是吓得不得了，成百上千的箱子都排到码头外面去了。马奇主教在教堂布道时也说，上帝不想过问中国的事，因为局势发展到今天是有理由的。阿拉不走怎么行？‘皇族事件’就是个样子，要死人的。”我从挂在墙上的镜框里看到了锦章和马奇主教的合影，那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中年传教士鼻子尖尖的，用一双慈爱温暖的眼睛深沉地望着我。

[1] 阿拉：吴语词汇，表示“我们”和“我的”。

2

我的猜测没有错，“倚云”号要接走的人果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马奇主教。等我回到船上时，马奇主教已经到了。轮船最上一层紧挨着驾驶舱的咖啡厅里，我意外地看到，跟马奇主教在一起的竟是香港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司劳顿。毫无疑问，劳顿先生也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跟我一起从香港登船，而我却毫无察觉。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同时表明我已经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劳顿先生没忘记半年前因为一桩港人杀英人的案件我曾经对他穷追不舍，神经质地摆着手说：“你别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青岛对我们是个陌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很多时候都得依赖记者的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互相依赖呢？都是为了把事件调查清楚。”他阴郁地盯着我，半晌不语，突然说：“不错，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我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动案、杀人案几乎每天都有，没听说联合国插手调查的，为什么独独对‘皇族事件’如此重视？”劳顿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奉告。我又问：“是不是受了德国的请托？”劳顿说：“你是在提醒我重视‘皇族’的归属国吗？《华报》是‘皇族’旗下的报纸，说到底你也是受雇于‘皇族’的新闻

记者，德国有没有请托你应该知道。”我说：“劳顿先生误会了，虽然‘皇族’是《华报》的股东，但我并不受它的控制。”“所以他们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联合国会插手？”看我点头，劳顿又说：“看来你得去问问联合国喽！”我立刻改变了话题：“劳顿先生能否告诉我‘五人调查委员会’中还有谁？”他又是两手一摊。我继续追问：“如果不便说出名字，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他们都是哪个国家的人？”“别问了，记者先生，没有人授权我回答你的问题。”“对不起，我的职业就是问。这个有主教大人和高级警司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的头是谁？”劳顿干脆扭过脸去不看我了。我转向马奇主教，向他说起我跟锦章的关系，说起我们都受了委托需要“关照”的玛丽娅。主教知道“玛丽娅”不过是个引子，接下来我的问题依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立刻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你见过陶锦章了？你应该说服他跟我们去巴黎，他有高超的医术，一定会受到法国人的尊重。”我说：“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劝劝他。现在请大人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主教会成为‘五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马奇主教冷下脸来，眼光滞涩地从我脸上扫过，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黑夜说：“看来你是不信基督的，不然就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麻烦一个德高望重的主教。基督无所不往，无往不胜，此外我不能告诉你任何别的。”

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由于劳顿和马奇的讳莫如深而变得复杂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调查范围正在扩大，至少扩大成了两个：一个是“皇族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另一个是“五人调查委员

会”的真实意图和联合国的目的。我想今后我跟他们还会有许多交道要打，不能让他们一开始就讨厌我，便客气地告辞了。

“倚云”号第二天早晨启航。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尽量不去打扰劳顿和马奇，见面只是笑着点点头，或者问一声好。直到我们踏上青岛口岸，就要在码头前的广场分手时，我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倚云”号挥手告别，然后问道：“劳顿先生、主教大人，知道‘倚云’号什么时候离开青岛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就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完毕之后，它会一直等着你们。真没想到，‘倚云’号成了你们的专舰。”他们显得非常吃惊。劳顿说：“如果一个记者想造谣，当然会挖空心思。”我说：“昨天我请船长共进晚餐，是他告诉我的。王耀武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让他静候调查结束。”劳顿敏感地瞪着我说：“你的意思是跟国民政府有约定？不，我们的调查是独立的。”我说：“我也不相信调查会受人操纵。”说着扫了一眼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有人从车旁疾步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是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吧？我是市政府外事局的局长张绪国，请上车。”我掏出记者证举在手里，大声问：“局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吧？”张绪国回答：“是。”我又扫了一眼另一边的一辆军车和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问道：“怎么还有军队？”张绪国说：“是绥靖区司令部派来保护二位先生的。”劳顿和马奇主教顿时有些尴尬。我向他们挥手告别，笑道：“调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还会请教二位调查大员。”

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拒绝乘坐国民政府派来接他们的轿车前

往市区，而是和我一样坐进了一辆敞篷式的单套马车。后来还听说他们拒绝了市长为他们安排的接风晚宴，更拒绝住进临海而立、装饰豪华且有士兵守卫的原德国领事别墅，而是住进了斐迭利街（中山路）的夏日旅馆。也许国民政府做一些迎来送往的安排，仅仅是为了表示对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尊重，但调查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尊重，因为“皇族事件”发生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政府显然是有责任的，任何过于亲热的接待，都会被看成讨好或者贿赂，尤其是在我这里。说真的，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不受“皇族”的控制，但吃人饭护人短，潜意识里，感情和立场都会起作用：“皇族事件”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管理到位、治安良好的地方。我和“皇族”以及所有心惊肉跳的外国人、替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埋怨不期然而然。

坐着能够唤醒我童年记忆的单套马车，我把自己安顿在了伊尔奇斯山前的海滨旅馆。伊尔奇斯山现在叫天平山，但我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也不想改。所有以往的称呼我都不想改，包括我从旅馆窗户里就能欣赏到的维多利亚海湾。它代表历史，能唤醒记忆，能让我在说国语时突然冒出一个英语词汇来，光那优美的音节就会让我陶醉半天。海湾东侧是维多利亚角，龙头一样昂扬着伸向大海，海水在龙嘴处激荡，在龙的身躯里静默，加上茂密的植物、起伏的山丘和氤氲的云雾，让它显得像一处仙境。我用英语问侍者：“维多利亚角现在有人居住吗？”侍者用英语回答：“先生，大概没有，从来没看到冒出过炊烟。”又瞅了瞅我，“先生，你会

说国语吧？”我点点头。他立刻变成了国语，是地道的北京话：“我知道先生会，先生最好说国语。”“为什么？”“你不知道‘皇族事件’吗？咱犯不着用嘴巴招惹人家，您说是不是？”侍者机灵，把他自己跟我划到一起了。我有些忐忑，表面上装作无所谓，仍然用英语说：“谢谢你的提醒，你好像不是本地人？”“祖上在北京。”“是清朝灭亡时来青岛避难的寓公遗老吧？”“正是。”我请他介绍一下海滨旅馆的饭菜，他用国语说：“这里的京味中餐最有名，尤其是宫廷菜。”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中餐有什么好吃的，油乎乎的。”

我欣赏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宜人景色，在海滨旅馆的西餐厅用过午餐，租了一辆脚踏车，直奔“皇族资本”。

3

因“皇族资本”的存在而命名的皇族街在1914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改名为姬路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又更名为兰山路。我自然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心里亲热地叫它“皇族街”。比起小时候看到的皇族街，如今这里已是又脏又乱了，人多，店多，车多，垃圾多，路面坏了也不修，马路牙子蚯蚓一样曲扭着翻起来，好几处都断了。下水道的铁质井盖没有一处是完备的，肯定早就送进兵工厂变成了枪炮子弹，深深浅浅的井上覆盖着烂草席或者烂木

板，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盖，就像城市的黑眼睛无奈地望着飘过烂云败絮的天。歪七扭八、伤痕累累的行道树还没有发芽，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想想小时候，这里干净得一尘不染，安静得能听到蝴蝶扇翅的声音，偶尔会有德国人从石条铺成的人行道上走过，戴着高筒礼帽，拄着亮闪闪的金属的文明棍，妇人和公主们的裙子拖在地上，地上的清洁和裙子的清洁是一样的。而我，一个中国小孩，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好奇而羡慕地望着他们。父亲是莱茵河牛肉店的雇员，负责把一份份切成方块的新鲜牛肉送到喜欢享受牛排的德国人家里。他剪了辫子，穿着老板为他特制的黑色燕尾服和领子浆得笔挺的白衬衣，细脖子上打着蓝色领带，以此为通行证，每天都在欧人区走家串户。他会骑马也会骑脚踏车，但为了表示对德国人的尊敬，他情愿不计苦累地走来走去。他喜欢带着我，因为据说这样我就可以受到西洋文明的熏陶。后来父亲又把我送进了魏玛小学，这是一所德国孩子才能上的小学，除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只是觉得父亲本事真大。所有羡慕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父亲本事真大。

好在皇族街的建筑依旧，都还是德国人的风格，阳台、拱廊、塔楼、罗马柱、偌大的绿色盔甲帽，浪漫而华丽的各色装饰就像土地本身一样凝固在飞驰的时间里。尤其是傲岸的“皇族资本”，右边是圆形的两层，左边是六角形的三层，中间是方形的五层，一律用赭色花岗岩砌成，结实得就像万年不坏的城堡，庄严而优雅、怀旧而稳健，就像一个有着世袭爵位的贵族，既有忍不住的炫耀，又

有死硬的不肯丢弃传承的保守。德国人把他们与生俱来的风度和气质融化在建筑艺术上，就算他们早已远离而去，“模范殖民地”依然发挥着“模范”的作用。

我穿过马路，把脚踏车靠在行道树上，走向“皇族资本”的大门。门柱前后、台阶上下，都站着警察，往上看，阳台和塔楼的窗洞里也有警察的影子，枪都架着，有步枪也有机枪，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再看对面，我的天，依然是德国式建筑的三层楼顶上，足有一个班的警察趴在外面，枪管直对着街面和皇族街的两端。戒备森严是可以想见的，但没想到会如此紧张。我被拦住了，一个警察厉声让我走开。我说我是来“皇族”办事的，我要进去。一个西装革履、打着红领带的中国人从门厅里出来，打量着我盘问起来。我如实奉告：来历、身份、目的，还拿出证件让他看，发现他还是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就把“皇族”和《华报》的关系也说了：“其实我就是‘皇族’的人，我来这里跟走亲戚是一样的，不信你去问问里面的人。”红领带去了，一会儿出来说：“什么亲戚，没人认识你。”我说：“可我认识他们的人。”“谁？”“玛丽娅。”“哪国人？”我傻了，居然没向锦章问清楚。我说：“外国人。”红领带冷笑一声推我离开。我又说了许多，但没有一句是起作用的，只好硬往里闯。红领带掏出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想找死啊？”

我只好离开，骑着脚踏车朝前走去。我对调查受挫并不沮丧，无非是多一点儿曲折、多费些功夫。在香港干记者，被人拒之门外

的时候多了，早已经习以为常。我来到斐迭利街的邮政所，拨通了锦章医院的电话，回答说锦章不在。又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请他告诉我玛丽娅的联系方式、住址、年龄、相貌、国籍，等等。大概是守着太太的缘故，锦章支支吾吾的，只说了她住所的地址，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我匆忙挂了电话，回身就走，一出邮政所，就见一个戴眼罩的独眼大汉立在门外，手里操着一根木棍，另有一个歪戴着礼帽的黑衣汉子正在搬动我的脚踏车，不远处是一辆封闭的三套马车。独眼大汉问：“你是‘皇族’的人？”看我点点头，又说：“你过来一下。”我看他脸色黑冷，独眼里含满阴光，没敢过去：“有什么事？为什么动我的车？”“阎王爷想见见你。”独眼大汉说着一步抢过来。我撒丫子就跑。他们喊着“抓贼”追过来。我对地形的熟悉挽救了我，等他们追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抡起的木棍就要够着我的头时，我拐向了汉堡街。前面不远就是警察局，我大喊一声：“救命哪！”警察并没有被我喊出来，但我身后的追杀却倏然不见了。

我余悸未消地回望着身后，伫立了半晌，心说：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皇族”的人？到目前为止，在青岛我只向“红领带”亮明了我的身份和意图，他和警察一样，应该是保护“皇族”的，怎么一转眼又使出人来要弄死我？

我来到警察局门口，说是来报案的。守卫用电话通报后让我等着，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被一个学生模样的小警察喊进了门厅。椭圆的门厅右首横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小警察歪靠到椅